

#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 权力与信任之间<sup>\*</sup>

凌胜利

内容提要：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美国亚太联盟 联盟转型 中美关系 权力差距 信任

作者简介：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 本文系“外交学院 2012~2013 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成果，同时也受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复杂系统思维与我国外交战略规划”和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东亚地缘环境变化与中国区域地缘战略”（项目批准号：11YJCGJW006）的支持。感谢王帆教授、曲博副教授、高程副研究员、金新博士和席桂桂博士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文责自负。

---

《当代亚太》2012 年第 5 期，第 33~55 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 引 言

近年来，美国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宣称要建设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这实际上是其进行的“以进为退”的战略大调整，美国将更加需要亚太盟友的帮助来实现其战略构想。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施政演说中指出，“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是构建美国太平洋世纪的六个关键行动之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是我们转向亚太的战略支点”。<sup>①</sup>也就是说，依托盟友关系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通过整合和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推动前沿部署，美国可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sup>②</sup>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联盟几经调整，通过利益的再协调、功能的再设置、关系的再调整、战略的再协商等，实现了联盟结构更趋平等化、联盟区域扩大化、联盟职能多元化等方面的转型。<sup>③</sup>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美国的亚太联盟仍将继续整合并呈现多种转型趋势。其中，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中美关系互动的视角分析美国亚太联盟的转型动力，将亚太联盟转型置于美国对华战略之下，主要通过分析中美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两个变量推断美国对华战略走势。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关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动力的既有解释与不足，并尝试提出本文的观点。第二部分主要总结当前对中美关系的三种认知并分析其内在核心要素——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受核心要素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四种趋势，即强遏制、弱遏制、强接触和弱接触，在此基础上分析由此引发的联盟转型。第四部分详细分析未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北约化、雁阵化、岛链化和赫尔辛基化的四大趋势，论述各种趋势的形成条件、原因和现状，并对未来联盟的各种指标做简要说明。

---

①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② Ibid.

③ 联盟转型是指联盟在联盟性质、联盟内容、联盟职能、联盟结构与联盟形式等联盟核心变量方面发生变化。参见凌胜利：《联盟的转型——在权力与信任之间》，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 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目前，国内外关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动力分析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分别从联盟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变化与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探讨美国亚太联盟缘何转型，这其中既有外力使然，也有内在驱动。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亚太联盟的内在变革要求联盟转型，涉及盟友间的权力变迁、战略分歧和利益分化等原因。<sup>①</sup> 由于美国的亚太联盟均属于双边不对称联盟，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由来已久，在很长时段内也维持了安全—自主的交易性平衡。不过，由于受到美国亚太盟友实力增长、安全威胁缓解、国内社会变迁以及美国维持联盟的成本意愿下降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亚太联盟原有的联盟结构、区域和角色等都难以为继，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具体而言，一是实力的变迁推动联盟角色的演变和结构调整。美国盟友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能够分担不断增长的联盟防务任务，加之安全自主程度提升，他们不愿再对美国一味地卑躬屈膝，言听计从，而是希望争取对美平等地位，美国与盟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渐调整，这就引发了联盟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二是战略分歧亟需联盟目标重新定位。冷战终结导致联盟战车的“捆绑效应”下降，美国与盟友间的战略分歧加大。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要求盟友的鼎力支持，而盟友则着眼于地区与自身利益，对此要求有所保留，因此，在联盟目标上需要重新定位才能弥合双方在战略上的分歧。三是利益的分化腐蚀联盟的社会基础。对经济、安全等利益的不同取舍导致美国与亚太盟友间的利益认知间隙加大，安全威胁的缓解与社会变迁则导致盟国对联盟的需求下降，联盟的社会基础弱化。这是从联盟的内在困境和联盟管理角度分析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动因，但其解释力仅限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

<sup>①</sup> Charles M. Perry, *Alliance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U. S. -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Herndon, VA: Brassey's, 2004; John Ikenberry and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 S. -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Harrison M. Holland, *Japan Challenges America: Managing an Alliance in Cris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The U. S. -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Mike M. Mochizuki, *Toward a True Alliance: Restructuring U. S. -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单个联盟转型，比如美日、美韩联盟转型，无法解释美国亚太联盟的总体强化，特别是联盟间联动的增多以及联盟整体结构的调整。

第二种观点认为，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联盟转型，促使美国的亚太联盟由“制衡威胁”转向“地区秩序建设”，联盟是美国对可能失衡的亚太安全秩序进行再平衡的重要平台。<sup>①</sup>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分明，美国亚太联盟的主要作用是制衡威胁，其鲜明的排他性特征对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被冷战环境所抑制。冷战结束后，安全威胁不再泾渭分明，美国亚太联盟无法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甚至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障碍，同时，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也导致其难单凭一己之力主导地区秩序。为此，美国需要变革其亚太联盟以符合地区安全的需要，同时也需要联合盟友的力量以实施其亚太安全战略。该观点认识到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对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影响，作为地区秩序的稳定器，美国亚太联盟需要调整联盟结构，加强内部的多边协作，优化前沿部署，并适时地推动亚太多边安全建设，以确保其延续的价值与合法性。尽管该观点认为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变化是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动因，并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了冷战终结、盟国国内政治变革、实力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等许多重要因素，但比较遗憾地是该观点并没有明晰到底是哪种原因构成美国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因而显得比较泛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崛起对地区秩序的冲击和对美国地区主导权的挑战推动了美国亚太联盟转型。中国的崛起可能导致亚太地区动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必然冲击美国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需要调整其亚太联盟来管

---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Working Paper 2007/4,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ips.cap.anu.edu.au/ir/pubs/work\\_papers/07-4.pdf](http://ips.cap.anu.edu.au/ir/pubs/work_papers/07-4.pdf); Jae Jeok Park, "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4, No 2, May 2011, pp 137-158; Ralph A. Cossa,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lliance-Based' East Asia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Vol 8, No 2, 2001, pp 66-80; Changhee Nam and Seiichiro Takagi, "Rising China and Shifting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America and Its Allies",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16, No 2, Fall 2004, pp 153-180.

控中国的崛起。<sup>①</sup> 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目标是维持对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弱化其对该地区的主导权，同时，中国崛起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令人担忧，因此，美国必须预防中国崛起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美国也意识到其无法单枪匹马地遏制中国，而是需要盟友、安全伙伴等亚太地区国家的帮助。不过，由于辐辏结构导致美国的亚太联盟聚合效应太弱，因而必须对亚太联盟整体结构进行调整，其中，加强盟友间的协作尤为必要。这种观点主要强调了美国崛起对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推动作用。由于中国崛起，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战略也相应调整，其亚太联盟也因此调整转型，中美关系的走向影响着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进程。该观点虽然认识到中国崛起对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影响，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重视中美战略互动的意义，无法说明中美关系究竟如何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核心要素到底有哪些。

总之，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纵观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的调整、特别是近几年的强化，可以看出，中国因素的作用显著增强。由中国崛起导致的中美两国间的战略困境，<sup>②</sup> 促使美国形成了一种“霸权焦虑”情绪，推动其调整了对华战略态势，希望通过强化亚太联盟来管控中国崛起，进而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对美国而言，其在亚太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是防止该地区出现挑战性大国，进而削弱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甚至将美国在亚太地区边缘化或挤出亚太地区。<sup>③</sup> 当前，由于中国的不断崛起，亚太地区格局变革加速，这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一定

---

① Aileen San Pablo-Baviera, "The China Factor in U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 Pacific",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7, No 2, July 2003, pp 339-352; William Breer, "U. 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External Threats", *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Commentary*, No 39,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0/05\\_east\\_asia\\_breer.aspx](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0/05_east_asia_breer.aspx); Dan Blumenthal, Randall Schriver, Mark Stokes, L. C. Russell Hsiao and Michael Mazza, *Asian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Project of 2049 Institute, [http://project2049.net/documents/Asian\\_Alliances\\_21st\\_Century.pdf](http://project2049.net/documents/Asian_Alliances_21st_Century.pdf); Balaji Chandramohan, "U. S. Strengthening Old Alliances in Asia Pacific to Contain the Influence of China", *Diplomatic Courier*, November 30, 2010, <http://oilprice.com/Geo-Politics/International/U.S.-Strengthening-Old-Alliances-in-Asia-Pacific-to-Contain-the-influence-of-China.html>

② 仇华飞：《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83~97页。

③ Evan A. Feigenbaum, "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Spring 2011, pp 25-43.

的挑战与冲击，促使美国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战略关注。<sup>①</sup> 为了继续维持和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愿看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其盟国）的关系发展过快，东亚地区合作超出其控制能力，因此会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对东亚合作施加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崛起也引发了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在安全上的担忧，他们希望发展与美国的安全关系，通过对冲策略防范来自中国的“威胁”，<sup>②</sup> 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中国进行一定的限制。因而在安全领域，防范和施压中国也成为美国及其盟友和其他一些亚太国家的共同目标。这种共同意愿推动了美国与盟友及其他亚太国家间的相互借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向中国施压。此外，亚太盟友的对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惟美国马首是瞻，并且美国也有能力介入或影响盟友的对华政策，在安全战略上更是可以施加影响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主导。事实上美国也是如此运筹。小布什政府的东亚政策就被认为是以联盟为基础。<sup>③</sup> 奥巴马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基调，在亚太战略中更加重视与利用盟友。“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凸显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和军事同盟的首要地位，使地区安全环境中的对抗性因素抬升。”<sup>④</sup> 通过介入危机、离间东亚国家间关系、渲染威胁和塑造安全，美国更为牢固地控制了其亚太联盟。“强化联盟关系对中国形成战略性限制，从而迫使中国不滥用地区影响力。”<sup>⑤</sup> 但是，仅有冷战遗留下来的联盟是不够的，具有排他性的美国亚太联盟并非亚太安全秩序的合适提供者，其面临着由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东亚安全格局变革的冲击，<sup>⑥</sup> 因此，其职能需要由制衡威胁转向秩序建构。无论是维持地区秩序还是规制中国，美国都需要变革其亚太联盟。毕竟亚太安全秩序的构建离不开中美两国，中国的崛起也是亚太安全秩序变革的重要变量，美国亚太联盟的适时调整与转型必须考虑

---

① Nick Bisley, "China's Rise and the Making of East Asia's Security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3, January 2012, pp 19-34.

② Aileen San Pablo-Baviera, "The China Factor in U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and the Asia Pacific", p 343.

③ Ralph A. Cossa,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lliance-Based' East Asia Policy", p 61.

④ 凌岳：《“亚太秩序与中美关系”研讨会综述》，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174页。

⑤ Ashley Tellis, "A Grand Chessboard", *Foreign Policy*, No 146, January/ February 2005, p 54.

⑥ 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p 44.

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趋势。在双边联盟与多边安全之间，中美关系尤为重要。因此，如何认识中美关系、把握影响中美关系的核心要素，对于理解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就显得尤为关键。

综合分析，从中美关系角度来考虑美国亚太联盟的转型更具说服力，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崛起对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和对美国主导权的冲击已成既定现实；二是与单向考虑美国的战略调整相比，基于中美战略互动考察亚太联盟战略的调整更有优势；三是兼顾了亚太盟友对华安全战略受美国显著影响的情形；四是将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置于其对华战略的变化调整之下。本文在对中美关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提炼出影响中美关系的核心要素，并据此分析未来美国对华战略走向及其对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影响。

## 中美关系及其核心要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富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sup>①</sup> 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引领世界发展趋势，因为两国关系的国际化程度已超越双边意义。<sup>②</sup> 目前，中美学界对两国关系的看法基本呈现出三种观点：冲突论、和平论与复杂论。

### （一）冲突论

中美关系冲突论主要基于权力转移和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并且这种结构性矛盾并不局限于崛起国与挑战国的矛盾，还扩展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其他领域。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sup>③</sup> 美国学者则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引发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最早会源自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之争。<sup>④</sup> 比如，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要求更多的话语权，

① 《习近平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新华社，2012年2月13日。http://www.gov.cn/ldhd/2012-02/13/content\_2065584.htm

② 吴心伯：《中美关系重新国际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21页。

③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页。

④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e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中国的经济实力必然转化为军事实力，并寻求地区霸权。<sup>①</sup>中国的国家利益拓展被美国视为威胁，对台湾地区、南海等国家利益的维护则被美国视为修正主义行为。

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并非仅仅源自体系性结构矛盾，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若干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歧、文明的冲突、地缘政治摩擦、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之间的天然对立以及在台湾问题上难以轻易化解的利害纠纷等五大方面。<sup>②</sup>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导致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其限度。<sup>③</sup>特别是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将制约中美战略互信的深度发展，也因此可能引发中美冲突。<sup>④</sup>比如，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认为，中美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sup>⑤</sup>也有学者担心中国过度自信的对外行为将导致中美之间上演现实主义的悲剧性对抗循环。<sup>⑥</sup>尽管持中美冲突论的学者尚居少数，但其影响却不容低估，特别是在美国国内大选、中美关系不畅的情况下，该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 （二）和平论

中美和平论主要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也有学者从权力与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中美相互依存的加深为促进两国和平提供了重要保证。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被乐观地认为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黏合剂与压舱石。<sup>⑦</sup>“中

---

①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3页。

② 袁鹏：《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空间》，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4期，第1页。

③ 参见傅梦孜：《中美关系发展的逻辑思考》，载《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第27～29页；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30～38页；唐永胜、卢刚：《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第52～60页。

④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259页；Michael Fullilove,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akeholder Spectru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3, Summer 2011, pp. 63-85. 美国学者中持这一立场的人更多。

⑤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e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n*.

⑥ David Shambaugh, “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1, Winter 2011, pp. 7-27.

⑦ 郎平：《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24～31页。



美的经济共生关系为两国注入了战略互惠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经济相互依赖和平’是实现中美各自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sup>①</sup>除了在经贸领域相互依存外，中美之间还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分歧，这为两国和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即使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深厚的利益基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复合的对话机制使得中美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相对可控。<sup>②</sup>在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下，两国还通过国际制度对彼此实现机制化制衡，形成了中美制度均势。<sup>③</sup>这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和平共处。

除了地区层面的机制建设外，双边机制建设同样有助于中美和平。近年来，中美之间高层互访频繁并形成了诸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高层次沟通机制，这为两国加深了解与信任、促进合作与融合注入了很大动力。制度合作是促进中美和平的制度保障，而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加深促成的洛克文化，<sup>④</sup>则从观念上提供了限制两国冲突的藩篱。也有学者从权力角度出发，认为中美权力差距的缩小提升了中国对中美关系塑造的能力。“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可定义为稳定因素，中国力量的增长在逻辑上有利于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sup>⑤</sup>中美权力差距的缩小增强了彼此战略限制的能力，进而限制了两国关系走向极端化。从战略互动视角来看，中国的对外战略一向是谨慎克制的，<sup>⑥</sup>而美国的对华战略往往具有多向性并以“两面下注”为主导，因而中美之间的大冲突很难形成，和平共处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关键在于两国在

---

① 唐小松：《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下的战略互惠及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第36页。

② 罗伯特·佐利克：《“从上海公报到全球利益攸关者”——在上海市美国学会、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国关系讲座上的演讲》，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第7页；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39页。

③ 祁怀高：《冷战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94页；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56~74页。

④ 何英：《试论中美关系是洛克文化的建构》，载《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第61页。

⑤ 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第46页。刘丰的研究认为，中美分别提供经济、安全保障共同促成了冷战后的东亚和平，参见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

⑥ 罗伯特·萨特：《中国崛起的挑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含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17页。

互动中如何明智地把握彼此的战略底线，如大陆中国与海洋美国的势力范围。<sup>①</sup>

### (三) 复杂论

中美关系复杂论目前已成为两国的主流共识，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认为两国关系十分复杂，很难简单地用一种“朋友”或“敌人”的身份加以界定。当然，日趋复杂的两国关系也给发展稳定合作的双边关系带来了挑战。<sup>②</sup>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相互认知、利益互动、机制化管理三个层面，并不断演化，<sup>③</sup>形成了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呈现出“敏感性、脆弱性与韧性并存、两重性等特点”。<sup>④</sup>不过，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现实也为两国的议题联系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在不对称相互依存中居于有利地位的美国，会在中美权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更多借重“多边施压”方式，<sup>⑤</sup>合作中警惕与遏制的一面也会加强，从而对中国更多地实施“合作型施压”。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两国关系不会出现大的冲突，而是会在相互竞争中保持张力，从而出现诸如“再合作、再平衡、再保证与再冲突”的路径，<sup>⑥</sup>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能是在波浪中向前推进，螺旋式地向上发展。<sup>⑦</sup>中美关系复杂论并不看重中美关系冲突或和平的结果，而是注重中美关系过程的管理，认为过程决定结果，同时对中美未来是“冲突”还是“和平”持不确定立场。

无论是冲突论、和平论还是复杂论，对中美关系的认知都绕不开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这两个核心要素。冲突论看到了中美权力差距缩小所引发的权

---

① 罗伯特·罗斯：《美中和睦：大国政治、影响范围与东亚和平》，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第4~10页；王帆：《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21~31页。

② “How to Develop a Stable and Cooperative U. S.-China Relationship”,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3, No 4, 2011, pp 185-189.

③ 陈东晓：《“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第35页。

④ 夏立平：《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非对称性相互依存》，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12期，第3页。

⑤ 刘建华：《“多边施压”与美国对华策略新动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第1页。

⑥ 庞中英：《美国对华政策的合作与冲突策略：另一种“相互确保摧毁”成立之后》，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1页。

⑦ 曲星：《中美关系在斗争与合作中“波浪型”前进》，中国新闻网，2011年9月23日。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09-23/3350202.shtml

力转移困境，也意识到中美之间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中美互信的限度；和平论认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认为通过制度建设可以提升两国的战略互信，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和权力差距缩小对两国战略相互限制的增强也是促成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原因；复杂论则认为中美权力差距缩小会推动美国加大对华防范力度，并借助盟友力量对中国进行多边施压，但中美关系也并非如权力政治那么简单，而是在不断互动中学习，预防与化解危机、增进互信，从而形成中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对中美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的认知决定了对两国关系的定位，影响着两国的战略制定及其互动。美国如何看待中美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也成为其对华战略制定的关键。关于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可谓众说纷纭，基于不同的数据甚至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实力与影响力的差异，数额与比例的不同等都会影响对中美权力差距的认知。近年来，关于加强中美战略互信的呼声不绝于耳，承认“信任赤字”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这些都表明信任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十分重要。

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对于两国战略互动而言十分重要。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挑战国的权力达到霸权国的三分之二时，双方最有可能爆发冲突。<sup>①</sup> 秦亚青教授通过分析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武装冲突支持行为，认为霸权护持是美国对武装冲突支持与否的根本原因，<sup>②</sup> 而霸权护持的主要途径是保持霸权国与挑战国的权力差距。当前，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则被认为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之一，因此美国对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十分敏感。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经济略显低迷的情况下更容易被放大，出现了“权力转移”说。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的认知为两国战略互动增添了对抗成分，但两国的权力差距并非左右两国战略互动的唯一变量，而是与两国信任水平共同作用于两国战略互动。<sup>③</sup>

---

①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id and A. F. 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LLC / Chatham House; 2000.

②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此处参考了巴里·布赞所提出的“极”与“极性”的概念。参见巴里·布赞：《美国与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 权力—信任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

由于美国的对华战略主要受两国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的共同作用，因而其对华战略总是体现出“两面下注”的特点——既接触又遏制，既合作又演化。无论采取何种对华战略，本质区别在于接触与遏制的程度。具体而言，根据权力差距的大小与信任水平的差异，美国对华战略将呈现如下态势：

中美权力差距大，信任水平低，美国对华战略呈现弱遏制；

中美权力差距大，信任水平高，美国对华战略呈现强接触；

中美权力差距小，信任水平低，美国对华战略呈现强遏制；

中美权力差距小，信任水平高，美国对华战略呈现弱接触。

关于中美权力差距的讨论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中国正日益崛起，美国却日渐衰弱，中美权力差距正在缩小；<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在高科技方面依然领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拥有对中国的主导优势，中美权力差距依然巨大；<sup>②</sup>还有学者认为美国虽然处于衰落之中，但相较于硬权力的相对衰弱，美国在软权力方面的优势却无与伦比。<sup>③</sup>基于对权力界定的认知分歧，对中美权力差距的认识也莫衷一是。鉴于此，本文所指的权力主要以中美两国的GDP数据为衡量标准。采用GDP数据来衡量中美两国的权力差距可以避免由于对权力的认知分歧所带来的意见不一，也可以避免由单一的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的比较所带来的片面化。GDP数据的直观性也是国内民众最能感受得到的，由此可能对政策影响较大。尽管采用GDP数据比较中美两国权力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仍不失为目前最好的衡量标准。正如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所指出的那样，权力存在多种定义方式，到底哪个定

---

① 布兰德利·沃马克：《中国崛起与美国：权力持平与文明磨合》，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第16页。也有学者从权力流散角度分析了世界格局的嬗变，参见陈玉刚：《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与国际关系格局扁平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29～34页。

② 这种观点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也比较受中国精英们的认可。参见《王岐山称中美实力差距大，全球经济复苏看中国》，中国金融网，2011年5月11日，<http://www.zgjr.com/News/2011511/home/368570666310.shtml>

③ 达巍：《从权力的“三张面孔”看美国的地位走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第1～7页。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软权力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参见Joseph S. Nye, “American and Chinese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4, October 2010, pp. 146-153.

义准确取决于其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力。<sup>①</sup>近十年来，中美 GDP 差距不断缩小，中国 GDP 相对于美国 GDP 的比例已由 2001 年的 12% 上升到 2010 年的 40%。<sup>②</sup>不过，对未来中美 GDP 的预测却颇为困难，需要综合考虑两国 GDP 增长速度的变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国内通货膨胀等因素。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所言：“以线性预测方式来推测经济发展趋势可以是具误导性的。”<sup>③</sup>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计，中国 GDP 将于 2018 年超越美国，而美国高盛公司则预测中国将于 2027 年超越美国，但这些预测都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中美 GDP 差距会进一步缩小，但由于 GDP 的质量存在差距，GDP 衡量下的权力差距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是存在一定的时滞，并且即使出现中国 GDP 超越美国的时段，美国的国际影响力<sup>④</sup>仍强于中国，依然可以依靠制度优势和借助盟友力量继续对中国施压。<sup>⑤</sup>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即随着中美权力差距的缩小，美国加大对华防范的可能性会上升，施压中国的力度也会加强。

关于中美之间的信任关系，从低到高基本上存在三种类型，即利益交汇型信任、制度构建型信任和认同共识型信任。<sup>⑥</sup>利益交汇型信任主要是指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建立起的一种理性的、工具性的信任关系，彼此的互惠互利推动了两国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但利益交汇型信任关系并不稳定，很容易受到贸易摩擦、偶发事件或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制度构建型信任主要通过制度建设和高层沟通实现，以增加信息共享，减少彼此误判，预防与化解冲突，提升战略互信。这也符合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即制度是国家间合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3, p. 422.

② 根据 IMF《世界经济展望》2010 年 10 月版数据库和 WTO 数据库计算。转引自竺彩华：《东亚经济何去何从？——从中美日经济实力消长谈起》，载《外交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87 页。

③ 约瑟夫·奈：《中国正超越美国吗？》，载《联合早报》2012 年 4 月 9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409.shtml

④ 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不只靠经济总量维持，还有其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以及盟国力量的支持。

⑤ 美国在 20 世纪初经济总量就首屈一指，但直到二战后才取得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中国不可以 GDP 居世界第二而自喜，一则中国经济并未实现稳健发展，不排除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的可能；二则经济实力很难迅速转化为相应的国际影响力。

⑥ 关于国家间信任的分类问题，参见刘庆：《“战略互信”概念辨析》，载《国际论坛》2008 年第 1 期，第 43 页。文中作者依据信任强度将信任分为低度信任（达成和平稳定共识）、中度信任（对外战略大体一致）与高度信任（高度身份认同）。

作的桥梁，制度可以培育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冲突。<sup>①</sup> 目前中美之间不断加强高层互访，设立副总理级、部长级对话，无疑是从制度建设层面谋求两国间战略互信的提升。认同共识型信任则是基于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共享和共识。建构主义认为，具有共同命运和利益相关的国家之间，如果彼此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遵守和尊重相同的规范，就会有效地培育彼此之间的信任。<sup>②</sup> 回顾中美建交以来三十多年的历程，中美信任从利益交汇型提升到了制度构建型信任，但从未达到认同共识型信任，中美之间建立成熟稳定的战略互信依旧路途遥远。<sup>③</sup> 对于美国而言，能够与之实现认同共识型信任的国家必定是政治制度相同、价值观念共享的国家，而中美之间显然达不到这一点，这也是中美两国许多学者所认为的两国关系发展的症结所在。但是即使中美之间信任水平较高，如果两国权力差距较小，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防范因素依旧存在。因而，相对于信任水平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更多地受权力差距的影响。

信任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由中美之间信任构成的类型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以利益交汇型信任为主导的信任关系被视为较低的信任水平，即使双方具备了一些制度构建型信任，但不足以预防和处理两国之间的危机与突发事件，可以认为两国信任水平依然较低；只有当能够对两国间的危机和冲突进行有效地化解，对利益分歧进行制度化管束时才具备稳定的制度构建型信任关系，才可被认为实现了较高的信任水平。对强、弱遏制或强、弱接触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只有遏制或接触的一面，只是两者相比较某一方面更显著一些而已。在具体手段、力量运用方面也会有所差异，如遏制战略更多采用军事施压和制度约束以增强中美关系中的对抗成分，调动亚太国家的对华制衡意愿，限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接触战略则更强调加强双边合作和制度包容，淡化安全威胁，管控危机冲突，强调合作价值，肯定中国的正面国际影响并促使其继续扩大。

在中美权力差距较大之时，中国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的战略重

---

①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8页。该文梳理了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的信任问题，对本文关于中美信任的分析很有启发。

②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合作的的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第19页。

③ 袁鹏：《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第30页。

心是应对其所认定的最大安全威胁。因而，无论两国的信任水平如何，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一面都弱于接触的一面，并且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将促使美国塑造中国向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而会不断尝试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不过随着中美权力差距的缩小，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性的一面会强化。特别是当两国权力差距小、信任水平低时，美国会加强对华遏制战略。即使中美信任水平较高，出于防范的考虑，美国也会对中国保持警惕，防止中国取代其霸权地位。鉴于美国对华战略的不同基调变更，其在亚太地区最为倚重的联盟也会出现相应调整。

表 1 美国对华战略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趋势	
	美国对华战略态势	强遏制
弱遏制		岛链化
弱接触		雁阵化
强接触		赫尔辛基化

### 1. 美国对华强遏制战略下的亚太联盟北约化

美国对华强遏制战略会推动亚太联盟的北约化。一旦美国确定中国对其霸权形成巨大挑战，就将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促成所谓的中美新冷战。<sup>①</sup> 在强遏制战略中，美国对华战略的目的在于防止中国挑战其霸权地位，主要采用军事施压和制度约束的方式迫使中国谨慎行事。受此影响，美国的亚太联盟调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推动联盟多边化，加强联盟间的武器协同与统一指挥；二是加大与准联盟、安全伙伴的军事合作强度，形成对华多层战略围堵；三是联盟对华战略对抗性加强，军事化程度提升。

### 2. 美国对华弱遏制战略下的亚太联盟岛链化

美国的对华弱遏制战略在联盟调整中主要体现为岛链封锁作用加强。<sup>②</sup> 中国虽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但除其核心盟友外，亚太其他国家对华制衡

<sup>①</sup> Balaji Chandramohan, "U. S. Strengthening Old Alliances in Asia Pacific to Contain the Influence of China".

<sup>②</sup> Dan Blumenthal with Randall Schriver, Mark Stokes, L. C. Russell Hsiao and Michael Mazza, *Asian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p. 9.

意愿不强，美国更多地是通过加强核心联盟间的合作来制衡中国。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局部地区联盟一体化加强，点一点之间协作增强，如美日韩三边联盟，美日澳安全合作等；二是三边化、四边化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作会分问题、分区域地更多出现；三是美国将通过联合军演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式加强与盟友、准盟友和安全伙伴之间的协作，以实现“以练代战”的目的；四是巩固和强化海洋联盟，实行“以海制陆”。

### 3. 美国对华弱接触下的亚太联盟雁阵化

如果中美权力差距依然小，信任水平较高（即具有较高的制度构建型信任，建立了一系列危机管理机制），美国对华战略将呈现弱接触态势。当前，美国的亚太联盟呈现层次化，形似“雁阵”，体现为美日、美韩、美澳联盟——美国的东南亚联盟——安全伙伴与准联盟的三级模式。<sup>①</sup>当中美权力差距小，即使两国间的信任水平较高，美国也不会放弃对中国的防范。美国可以允许中国在东南亚等大陆地带存在一定的影响，但绝不能容忍其铁杆盟友日、韩、澳倒向中国。据此，美国一会牢牢巩固美日、美韩、美澳联盟，通过联盟利益拓展、联盟内外调整来巩固强化联盟；二会重点加强对其他亚太盟友和安全伙伴的经济、安全合作，以此巩固和提升双边关系；三会推进中美军事合作以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四会有限度地推动美国可控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以满足地区力量变革的需要。<sup>②</sup>

### 4. 美国对华强接触战略下的亚太联盟赫尔辛基化<sup>③</sup>

美国对华的强接触战略会不遗余力地尝试将中国纳入其安全体系，因而会淡化其军事联盟的对抗色彩，在借重联盟作用的同时推进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增强安全合作的包容性，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之中，实现对华的“制度制衡”。<sup>④</sup>美国可能采取的策略有三点：一是将

---

<sup>①</sup> 钟飞腾、张洁认为，奥巴马的雁型安全模式分为四级，其目标主要在于制衡中国，但也适应地区内多种安全需求。参见钟飞腾、张洁：《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44页。

<sup>②</sup> Jae Jeok Park, “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pp. 137-158.

<sup>③</sup> 关于赫尔辛基化的特点可参见朱立群、林民旺：《赫尔辛基进程30年：塑造共同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2期，第16~20页。该文认为，赫尔辛基进程推动欧洲地区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观念传播和区域安全共同体建设。

<sup>④</sup> 关于制度制衡的研究可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Routledge, 2009.



现有东亚合作机制扩展到安全领域；二是创建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三是利用安全机制改革以容纳中国等国的参与，实现由双边主导向多边化的过渡。

##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四大趋势

受中美间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的影响，在美国对华战略的引导下，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多种可能趋势，不同的发展趋势对中美关系与地区合作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在合作与对抗之间，美国的亚太联盟将出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赫尔辛基化四种趋势。

### （一）北约化

近年来，由于美日韩、美日澳、美日澳印等多边安全合作的增强，加之中国崛起对地区秩序所造成的冲击，关于“亚太版北约”的说法不时出现。其实，关于为何没有“亚洲版北约”的探讨在学术界已有多种说法，<sup>①</sup>而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未来美国亚太联盟是否北约化依然具有意义。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中美权力差距便会缩小，美国的“霸权焦虑”便会增强。而与此同时，如果中美间的信任水平并未有很大改进，依然停留在利益交汇型信任和较低的制度构建型信任水平，那么，中国权力增强的投射将被美国视为修正主义，美国必定会联合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性一面会高度强化。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会引发美国亚太盟国更大的担忧，这将促使他们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sup>②</sup>在美国对华强遏制战略的主导下，有关“中国威胁”的认知高度集聚，美国亚太联盟的北约化极有可能出现。在此需要明确的是，“北约化”是指冷战时期以军事安全为主的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北约多边联盟，而非冷战后历经调整转型的北约组织。

---

<sup>①</sup> 参见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z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a 3, Summer 2002, pp 575-607; Victor Cha, “Power 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a 3, Winter 2009/10, pp 158-196.

<sup>②</sup> 近年来，美国几乎全面强化了与其亚太盟国的关系，如美韩联盟重新定位，美国重新在菲律宾驻军，美国开始在澳大利亚部署军队以及美国与新西兰联盟关系的转圜，此外，美国还加强了与新加坡、越南的安全合作，加大对台湾地区的军售力度。

要实现美国亚太联盟的北约化，美国将在武器协同、指挥统一等方面有所加强，同时也会加强联盟制度建设。具体而言，美国亚太联盟的北约化在联盟性质上是攻防兼备，依据中美两国互动态势择机进退；联盟内容表现出强烈的军事安全色彩；联盟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威胁，<sup>①</sup> 在制衡中国威胁的同时对中国周边国家加强施压与渗透，通过楔子战略分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在联盟结构上美国及其盟友会相互支持，呈现网状合作；联盟形式高度多边化，通过联盟制度聚合盟国预期，减少集体行动成本，与此同时也会与非盟国实行非正式的多边协作；联盟目标比较单一，主要是制衡来自中国、朝鲜等国的威胁；联盟规范性较强，制度化水平较高；联盟手段包括海外驻军、军事援助和武器转让等多种方式；至于联盟区域，北约化的亚太联盟极有可能超出亚太区域而辐射全球，比如策应中东和中亚。

目前，美国亚太联盟的北约化显现出一些苗头，主要表现为美日韩、美日澳印、美日澳等多边联动频繁，美国亚太盟友间的多边合作加强，联盟整体性得到局部提升。美国还不遗余力地打造其在亚太地区的民主联盟，希望加强美日韩澳甚至印度等民主国家的价值共识，以此推进他们之间的安全合作。在东北亚地区，受地区危机和突发事件的频繁影响，美日韩加强了对朝核政策的协调，签署了一些低级安全合作协议，2012年6月，美日韩还首次举行了联合军演。2010年，日澳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加强了联合军演，美日澳安全合作有所加强。2011年12月19日，美日印三国在华盛顿就“有共同利益的地区与全球性问题”举行对话，借此加强战略协调。通过多边军事演习与低级别军事合作，美国的亚太联盟将逐渐加强多边合作；不过，由于对集体安全的历史记忆以及多国武器协同的困难，美国亚太联盟转型为多边联盟依然遥远。<sup>②</sup>

## （二）岛链化

冷战期间，由美国主动构建起来的亚太联盟实际上是各自为战，彼此并不呼应，这势必要求美国投入大量的前沿部署甚至是重复部署以实现前沿存

---

<sup>①</sup> 对于美国的盟国来讲，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强势是一种威胁。参见 William Breer, “U. 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External Threats”, *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Commentary*, No. 39,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0/05\\_east\\_asia\\_breer.aspx](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10/05_east_asia_breer.aspx)

<sup>②</sup> Dan Blumenthal with Randall Schriver, Mark Stokes, L. C. Russell Hsiao and Michael Mazza, *Asian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p. 9.

在的效果。冷战后，美国多次对其亚太前沿部署进行调整，实现了功能整合、机动性增强与效率提升的目标。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最初战略构想是形成“环形防线”，<sup>①</sup> 主要基于第一岛链展开。控制海域也是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底线。<sup>②</sup> 不过，随着中国海军的不断发展，美国曾经依靠的第一岛链的天然封锁作用已大为减弱。中国海军的发展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忧，并根据美国自身历史经验和一战前德国的发展路径来论断这是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开始。<sup>③</sup> 因此，加强美国亚太联盟间的协作，提升岛链封锁的监测作用，阻遏或滞缓中国海军的发展进程，限制中国的海外军事影响是美国亚太联盟调整的主要目标。

通过整合亚太前沿部署，实现岛链监控，加强向争议海域施压，美国对中国海军的发展格外关注。<sup>④</sup> 为了提升联盟的岛链化功能，美国对盟友的空海军备转让将渐趋松懈，更注重预警系统建设，增强指挥信息沟通，加强亚太地区空海部署，侧重濒海战斗舰等近水海军部署，对中国海军实施所谓的“绊网战略”，从而实现美国在东亚地区“以海制陆”的褐水战略。总而言之，为实现亚太联盟的岛链化，美国将加强美日韩澳海洋联盟建设，增强岛链监控功能。联盟岛链化在联盟性质上表现为外向防御性；联盟内容以军事安全为主，但也会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合作；联盟职能是在制衡威胁的同时加强地区安全秩序建设；联盟形式体现为多边协作，即介于双边化和多边化之间；<sup>⑤</sup> 联盟规范程度相对于北约化而言较弱，但在重要的双边联盟中规范程度较高；联盟手段体现为海外驻军、联合军演和武器转让等；联盟区域以亚太地区为主。

在推动亚太联盟岛链化方面，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促进相邻盟友之间的合

---

① 约翰·刘易斯·盖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3~101 页。

② 罗伯特·S·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亚安全：从 1949 年到 21 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11 期，第 42 页。

③ 《外媒称中国海军有能力给美国制造难题》，载《参考消息》2011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④ 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岛链战略，参见理查德·哈罗兰：《美军组建太平洋新防线——岛链战略升级版》，载《国际展望》2007 年第 24 期，第 68~73 页。中国发展海军被认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表现，参见 Kazuhiko Noguchi, “Bringing Realism Back in: Explaining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 in the Asia-Pacific”,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2011, p. 60.

⑤ 在双边与多边之间加强联系，参见 Jae Jeok Park, “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p. 154.

作，如日韩、日澳、澳印之间的安全合作。这一点目前已得到一定的体现，如日韩、日澳之间近年都签署了一些安全合作协议，澳印也在国防合作上有所发展，2007年两国签署了情报共享安排协议，2011年12月，两国决定举行正式的双边海上演习。<sup>①</sup>此外，美国的亚太盟友都希望加强与美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以拓展联盟利益，促进联盟转型。美国的亚太盟友扼守海洋，对中国海军发展都有所担忧，加强盟友间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可以促进美国以海制陆战略的实施，同时也能提升盟友间的多边合作制度化水平。通过撮合盟友之间加强安全合作，不仅可以提升美国亚太联盟的聚合作用，还能减少自身的负担，因此，联盟的岛链化符合目前美国所实施的加强伙伴能力建设的战略。

### （三）雁阵化

美国推动其亚太联盟雁阵化是在战略资源受限以及威胁并未完全凸显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战略序列优化。在雁阵模式中，美日、美韩、美澳联盟是构筑美国亚太联盟坚实骨架的“三驾马车”，处于核心联盟地位，美菲、美泰等联盟以及美台、美新等准联盟或安全伙伴处于外围。<sup>②</sup>

在雁阵化联盟中，联盟性质以防范为主，主要是防范美国丧失在亚太地区合作的主导权或被挤出东亚合作进程。<sup>③</sup>联盟内容呈现出传统军事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的局面。具体而言，在核心联盟中，武器协同与指挥沟通程度会大幅度提升，通过美国的居中协调，美日韩、美日澳三边协作联盟会有效提升美国亚太联盟的多边化水平。如，2010年东北亚发生一系列突发事件后，日韩安全合作加强，不仅打算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军需相互支援协定》，而且还首次举行美日韩联合军演，以此强化核心联盟。在与外国联盟和安全伙伴的关系中，美国会通过军事演习、非传统安全合作来深化

<sup>①</sup> 赵青海：《澳印关系：尚未成熟的战略伙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50～62页。

<sup>②</sup> 关于美国亚太联盟不同的任务分担，参见 IISS Strategic Comments, “America’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Vol 11, Issue 3, May 2005, [http://cwebmail.mail.163.com/js4/read/readdata.jsp?sid=RDtoTkcyIgiDSLygfVyyiMnChyWuwJxL&.mid=91;1tbiWwUW5U9osm9h4wAAsV&.part=3&.mode=inline&.l=read&.action=open\\_\\_attach](http://cwebmail.mail.163.com/js4/read/readdata.jsp?sid=RDtoTkcyIgiDSLygfVyyiMnChyWuwJxL&.mid=91;1tbiWwUW5U9osm9h4wAAsV&.part=3&.mode=inline&.l=read&.action=open__attach)

<sup>③</sup> 有学者认为：“美国担心的是亚洲的合作进程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丧失主导地位，从左右逢源到左右为难。”参见王帆：《奥巴马政府的东亚安全政策考量》，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18页。

安全关系，同时美国还将通过军备转让、军事调动的方式加强在这些国家及其周边的军事影响。<sup>①</sup> 雁阵化联盟的主要职能是对潜在威胁保持压力的同时确保地区稳定，为此，美国需要与盟友之间加强合作，但辐辏式的联盟结构改观不大，美国仍处于主导地位。<sup>②</sup> 核心盟友与美国相互支持，边缘盟友与安全伙伴则更多地是依附于美国。就联盟形式而言，雁阵化联盟兼具双边联盟与多边协作联盟的特点，任务导向型联盟也会经常出现。联盟规范程度相对较弱，除了核心联盟的制度化程度较高外，其他盟友的联盟规范大多刚性不足，强制性条款较少。联盟区域也呈现分化状态，核心联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活动，而边缘联盟一般在本国周边地区或次区域活动。

#### (四) 赫尔辛基化

如果中美权力差距较大，中国并不能在中短期内对美国构成威胁，并且中美两国通过经济合作、制度沟通等手段实现了较稳定的信任水平，那么美国便有可能推动其亚太联盟的赫尔辛基化，倡导共同安全，通过接触手段将中国逐步纳入美国的亚太安全秩序之中。<sup>③</sup> 目前，亚太地区还缺乏一个由亚洲国家主导的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中短期内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构建也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因此，亚太安全构建的关键便是美国的亚太联盟与未来的亚太安全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并轨、嵌套还是替换，美国的亚太联盟的影响都无法回避，而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则最有可能成为发展的主导方向。如此，亚太联盟的赫尔辛基化遂成为能兼顾各国利益的最佳选择。要实现美国亚太联盟的赫尔辛基化，其目前的双边联盟的军事色彩与对抗成分都会有所减弱，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参与会更趋积极。<sup>④</sup> 联盟赫尔辛基化后的性质基本上是内向防御性，联盟内容涉及军事、公共卫生和环保等综合安全各方面；联盟职能由制衡威胁走向地区秩序建设，以维护地

---

① 最近美国对其亚太驻军进行了调整，在坚守第一岛链的同时也加强了第二岛链的防范，向菲律宾、新加坡转让了一些军事设备以加强这些国家的防卫力量，并且在这些国家周边不断举行军事演习以凸显其军事存在。

② Jae Jeok Park, "The US-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p. 137.

③ Roger Cliff and Phillip Saunders, "US Policy Options toward an Emerging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3, 1999, pp. 421-451.

④ 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p. 44.

区稳定为主，防范地区动荡与进行危机处理；联盟结构主要是互助型，美国主导色彩削弱，多边化程度得到极大提升；联盟规范程度较强，对成员国的自律性要求很高；联盟主要关注本地区的安全事务，促进本地区的和平建设，但也有可能在联合国授权下参与其他地区的危机应对与和平建设等工作。当然，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建设任重道远，其稳定性也屡受质疑，<sup>①</sup>但较之于新冷战的前景无疑更好。

表 2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四种趋势

	联盟性质	联盟内容	联盟职能	联盟结构	联盟形式	联盟目标	联盟规范	联盟手段	联盟区域
北约化	防御/进攻性强	军事安全	防御敌人	支持型；网状	多边化	制衡威胁较为单一	强	海外驻军，军事援助，武器转让等	全球与地区
岛链化	外向防御性	军事安全为主	防御敌人为主	支持型；点一点状	多边协作	制衡威胁为主	弱	军事演习，军事援助，武器转让等	地区
雁阵化	防御性	综合安全	防御；敌人；地区维稳	依附型/支持型；辐一辘状	双边/多边协作	制衡威胁；构建地区安全秩序	较弱	军事演习	地区、双边
赫尔辛基化	内向防御性	综合安全	地区维稳	互助型；扁平状	多边化	共同安全；合作安全	较强	危机处理，军事演习	地区

## 结 论

通过对中美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的分析，可以得出美国对华战略强遏制、弱遏制、弱接触和强接触四种态势，在此引导下，美国的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与赫尔辛基化四种趋势。当然，本研究只考虑中

<sup>①</sup> Nick Bisley, "China's Rise and the Making of East Asia's Security Architecture", p. 19.

美关系互动下的美国对华战略态势，并未分析中国与美国的盟国以及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组关系对于美国亚太联盟的转型无影响，只是相对于美国对华战略而言，这两组关系对于美国亚太联盟的影响要弱一些，并且受中美关系影响明显。权力差距主要基于两国的 GDP 数据进行比较，不过对未来经济的预测也颇为困难，因而中美两国权力差距的估量也包含着不确定性因素，并且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存在时滞，但这并不影响 GDP 作为观察两国权力差距的重要指标。中美两国信任水平正逐步提升，正在由利益交汇型向制度构建型转变，但这并不稳定，且两国间很难实现认同共识型信任。不过，即使中美信任水平提升，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变量还是权力差距，只是单一的权力差距并不能决定美国对华战略态势。另外，本研究提出的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四种趋势只是四种理想模式，特别是联盟的岛链化与雁阵化之间的界限并不大，并且当前美国的亚太联盟也最有可能转向这两种模式，其原因在于一是中美权力差距缩小的趋势以及信任水平的限度；二是美国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需要借助盟友、安全伙伴的力量并使其分担责任。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要接受美国亚太联盟存在的事实，还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化解美国联盟的压力。一是在与美国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促进中美军事交流、推进两国制度构建型的战略互信建设，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学会共处共荣之道，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发展与繁荣。二是淡化美国亚太联盟的军事色彩，以经济合作的互利共赢淡化安全威胁的相互担忧，推动美国亚太联盟对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关切，推动美国亚太联盟的“赫尔辛基化”。三是加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减弱地区各国的安全担忧，降低亚太地区联盟需求度，以包容性更强的安全复合体“覆盖”美国亚太联盟。<sup>①</sup>四是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刚性，不惧怕烈度的冲突，从而促使美国学会对华谦让以示必要的大国间的相互尊重。

---

<sup>①</sup> 王帆：《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20页。

# Abstracts

## **China's Ri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n Structure and Dire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n Order** Zhou Fangy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n structure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n orde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ise. It argues that China's rise fundamentally changes regional structure of East Asia, as two economic and security centers have emerged and become polarized in the region.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a combined product of the dynamics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rise, the American "conengagem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the majority of East Asian states hedging their policies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existence of these two power centers in East Asia has caused East Asian states to further hedge their policies towards the U. S. and China. A dual structure brings with it negative impacts for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nd has resulted in the region's great powers and critical actors us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as instrumental tools, and manipulating regional configurations to serve the ends of power competition. In sum, as a dual structure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e need to consider how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order. Fundamentally, s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East Asian order requires that China and the U. S. identify new modes of engagement.

**Key Words:** East Asian Structure; East Asian Order; China's Rise; Strategic Hedging

**About the Author:** Zhou Fangy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A Shifting American Alliance in the Asia-Pacific: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ower and Trust** Ling Shengli

**Abstract:** The strategic pillar of America's Asia-Pacific Strategy is its regional alliance, while mobilizing its allies to make changes or reforms is a key means through which the U. S. implements its strategy in the region. In recent years, change in the U. S. Asia-Pacific alliance has been particularly evident.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most convincing argument is that Sino-U. S. relations are the primary driver behind the shifting U. S. Asia-Pacific



Alliance. More specifically, 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gap in power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and the low levels of trust, both positions of containment and engagement emerge in America'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leading to changes in the strength of the American Asia-Pacific Alliance. America'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s the centerpiece of its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in managing China's rise, America does not operate alone. America must mobilize a shift on the part of its allies. Depending on how America's policy towards China shifts towards stronger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its Asia-Pacific Alliance will exhibit the following trends: development towards a NATO-style grouping, emergence of chain of allied islands, a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allies, and a movement towards a Helsinki style agreement.

**Key Words:** American Asia-Pacific Alliance; Alliance Transiti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ower Differential; Trust

**About the Author:** Ling Shengli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 **The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t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Consider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hen Xiaoding and Liu Feng**

**Abstract:** The present deficit of effective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has led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 debate whether crafting simple and systematic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s possible, and whether such theories stemming from structural realism are tenabl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ssessment of both progress and gaps in the literature on foreign policy theory stemming from perspectives of offensive realism, defensive 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other realist schools of thought. The article continues by attempting to develop a simple yet powerful theory which can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tructural 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closing, the article applies structural realist foreign policy theory to explain patterns in Chinese diplomacy and to illustrate the prospects for applying such theories to future foreign policy efforts.

**Key Words:** Structural 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Defensive Realism; Offensive 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bout the Authors:** Chen Xiaod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of Lanzhou University; Liu Fe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Zhou Enlai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